

【史学理论】

新史料、新问题与新史学

——从华北区域史研究看史学与史料的关系

郝 鑫

【摘要】历史学由于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史料在研究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史料对于历史学的推动作用包括了史料的发现和运用方法两方面,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兴起和发展即是一个有效的例证。回溯近百年的华北区域史研究,海内外的众多学者呈现出了至关重要而又纷繁复杂的研究积累,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研究者对史料的选择与认识,以及其研究问题和时代需求之间的关系影响而成。在当今新的时代下有了不同的学术问题和需求,华北地区新史料的发现,给未来的历史叙事指出了新的可能和路径。

【关键词】契约文书;区域史;华北研究;史料选择;问题意识

【作者简介】郝鑫,女,陕西汉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21.4.10~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华北乡村经济研究及民间文书数据库建设”(18AZS002)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清至民国华北财政与金融问题研究——以清华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2019THZWJC40)的阶段性成果。

傅斯年在20世纪早期提出“近代史学就是史料学”,在中国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引发的争论影响至今。本文无意讨论史料派与史观派之间孰对孰错,但史料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新史料的出现每每推动了史学认识的进步,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内阁大库档案等四大新史料的发现,是支持和激发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回顾以往,对于史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新史料并不必然以考古发掘等方式从土地里“从无到有”,而往往是在学者以新的学术范式的视角下重新“看见”了以往不被重视的材料而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若没有20世纪初期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近代实证史学方法的传入,这四大发现怕是难以引起这般轰轰烈烈的反响。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运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由此而言,新史料的发现也意味着新一时期的学术潮流和问题意识的出现,对于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史料的意识和态度也就体现着不同时代下各异的叙述方法和理论观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史料也就是历史学的体现。

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即为一个有效例证:自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众多学者运用了不同的新史料以及新的史料处理方法对华北地区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曾数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近几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发展迅猛,以南方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华南学派自树一帜,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强劲力量。华北区域研究也在近百年海内外一众知名学者的深厚积淀下,以清华大学馆藏的契约文书群等新史料的出现为契机,显示出极强的潜力和前景。华南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源自南方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和将其运用于地方和国家的互动关系探讨的新方法。追溯华北区域研究的历程,其问题意识和史料运用也在不同时代反映了其复杂的关系。以时间为轴的不同研究群体对于华北有着迥异的理解和表达,根源在于其时代、主体身份的差异导致了研究者的现实需求和对于未来过去的认知的区别,影响了他们对于史料和研究的观念和行动,最终凝结成为现今呈现出来的多层次的华北区域历史研究。通过对中国历史中至关重要而又纷繁复杂的华北区域研究进行历史化和时间化的审视和自

省,有利于研究者了解目前的华北历史经验是如何由历史知识和研究者的期待想象杂糅形塑而成,厘清其中史料与研究问题的相互关联,才能使我们明确当今新时代下华北区域研究的新可能。

一、新问题发现了新史料

陈寅恪对于当时的新材料敦煌写本的发现和运用,就发出了如此感慨:“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每一时代的史学研究都会由于现实社会以及理论关怀等等因素产生新的学科范式和问题意识,新问题决定了对于史料的新看法,而新史料的发现则为新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机遇。观之近代华北区域史学研究的发展,也是如此。不论中外,每一时代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史料类型为研究主体,都反映出其背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问题意识。虽然每一位学人由于其个体生命历程和主观意识选择的差异,其史料选择和研究成果肯定会有更加复杂的动因和各不相同的背景,难以由其国别和时代一概而论,但是每一时期中扛鼎之作总是会或明或暗地反映了其时代的潮流。总体而言,历代华北研究中史料运用和态度的变化表现出史料与史家学术方法之间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严格区别了史料的范围,以官书政令、经书经典等书本典籍为主体,导致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思想史为主。至晚清民国,由于时局政治等大变局,出现了章学诚六经皆史、梁启超历史研究法、顾颉刚古史辨等等倡议,提出改变传统观念中对于史料的划分。傅衣凌深受其影响,加之他留学日本,接受了日本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理论知识。二战期间,傅衣凌在福建老家发现了一批闽北契约文书。他以民间文书证史,用其讨论了福建佃农经济。新的史料在傅的理论建构之下焕发了活力与生机,傅衣凌开创了利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先河,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其著作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成为美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来源。

不仅是傅衣凌一人,20世纪上半叶的一代中国学者,在中国战乱频仍的时局中,以救亡图存爱国忧民的热忱关怀,在继承传统史学传统的同时,广泛吸

收了西方各种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思想转向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矛盾和社会经济问题,努力从区域研究的个例来探索和判断中国的国情实况。现代意义上的华北区域研究由此开端并且成果辈出,新的史料也在新的理论和视角下开始涌现。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的计量统计等学科和方法的深刻影响和华北高校研究人员众多的地理优势下,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组织带领调查团在华北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试图以此来研究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李景汉、吴景超等人对于华北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建立在其对河北定县的社会调查之上。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等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也是在其带领调查团在河北清苑调查时所作。华北区域社会调查和研究顺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热潮而兴起发展,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分析,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调查以及国民政府各部门主持操办的各地方报告等。^②这一时期,中外学者交流频繁,中国学者多有留学经历,受到当时普遍科学化的史学理论影响;很多西方学者亲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也有不少的国外基金会对于包含上述的很多国内社会调查进行资助。西方学者在中国影响大、范围广、全面系统的社会调查如卜凯(John Lossing Buck)在组建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主持了遍及全中国包含华北地区在内的农业经济调查,在西方经济学视角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了海量的农村调查数据,形成了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最完善的一批统计资料之一。同时他以此写就的《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等研究,也使得卜凯享誉中外,成为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此外二战期间,作为中国战场侵略一方的日本,此时也由于现实需要,积极在中国进行农村社会实态调查。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也被称为“满铁”)以田野调查和口述资料为主,在中国华北地区多次进行中国农村农户调查。“满铁”调查包含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数百份各地村庄农户调查报告,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是以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华北以及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史料。

这一时期华北乡村社会调查作为新的史料被众多中外学者“发现”并使用,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与学理问题意识。首先,这一史料的运用与当时代的现实政治格局状况是分不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中国也深陷其中,在战火纷飞国家存亡之际,学者们要探寻当代中国困顿的原因和出路,则必然从社会调查了解广阔中国社会的现状,并且目光上溯到历史中的传统中国社会来求方问药。中国学者出于振兴国家的理想向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答案,而美国由于远东策略需要了解之前不受重视的中国,日本则由于侵略战争的直接需求即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发起中国调查。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受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以实地调查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为主,似乎理论建构不足。虽然可以用当时历史条件和理论水平有限的理由进行说明,但实际上,这样的资料收集方式和写作手法是有着深刻的理论问题关怀的,也是这样的学理意识导致了如此这样的“史料呈现”。中国学者在战局之中,最为关切的即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矛盾症结问题,也是因此有了民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农村性质论战等大讨论。然而这些学术上的争论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为了不卷入学术以外的纷争,这些潜心研究的学者选择了“让史料说话”这样“无理论假设前提”的实地调查史料呈现方式。另一方面,作为受到外国政府资金支持的学者,不论中外,也都以对当时来说最有价值的中国实地资料调查为最主要的呈现方式。最后,即使当时中外学者都选择社会调查作为史料和研究,但观察其研究对象和调查的内容与方式,还是可以透露出其背后理论关怀和问题视角的不同。

中国学者如陈翰笙等人在这一时期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为指导,在社会调查中多关注生产关系,如农户的阶级差异、地权分配和土地制度等。而美国学者卜凯则以类型学的方法设计问卷,以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直接申明“本调查对于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之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不冀详细评述。……本调查仅限于评述中国土地利用之特质”。^③卜凯的社会调查只注重农村的生产力,如耕作技术、改良土地等方面,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农业

的问题在于广义的技术上的“落后”(因此后来被瑞斯金称为“技术学派”),而不是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认为的土地分配不均(被瑞斯金称为“分配学派”)。^④这样的中美视野方法关怀的差异由于社会和学术等原因,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日本的社会调查以东大学术人员所建立和参与的法人类学的学术模式下,逐家逐户进行访谈调查,同样以社会经济方面为调查研究的重心,是中国以自然村落为单位最为详尽的资料。这样的现实政治影响和理论关怀的差异,以及社会调查这类资料具有的采访中的语言困难和受访者差异等不可避免的问题,使得各国学者所做的社会调查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些资料中翔实丰富的内容以及当时学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对于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深刻见解和问题。

二、新史料与“旧”方法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华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有着明显的转向。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各国的学者都使用实地调查作为史料,立足华北农村来试图一窥中国全貌,以微观来分析整体。那么在50至70年代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转而选择了不同的史料,但与20世纪上半叶相同的是不少中外学者都选择站在了更宏大的理论问题之上,由上而下来观察中国以及华北。在中国,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的展开,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应迅速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下,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使得学者的目光从以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实录官书,转移到了记录社会生活运作的文集、方志、小说,扩大了史料的搜寻范围。笔记小说虽然以其鲜活生动的文笔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细节生活,但是着重于文学性的描绘,不在意具体事件的真实性,内容也多互相抄袭或相悖,轻易难以取信。而各地方志虽然内容相比正史书籍更为具象丰富,但是由于其编撰者自身的关注和框架化的体裁,使得方志内容往往隐恶扬善,且流于平面和形式化,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疏于记载。同时在史观的强烈影响下,这一时期涌现的很多华北研究像是在既定的同一叙事框架下的国家史的地方副本。即使扩充了史料概念,“发现”了新史料,但是在论述写作的套路与

传统中国的地方志书并无二致。

这一时期,中外之间的联络交往少,也难以进行史料和研究的学术交流。其中对于华北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马若孟(Ramon Myers)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就的经典著作《中国农民经济》,所使用的主体材料即为上述的“满铁”资料,也是首部系统使用“满铁”资料做出的专著,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相比于卜凯普遍而粗略的农村问卷调查数据而言,马若孟虽然还使用了满铁调查员以村庄为单位的长期细致的调查,但他的研究和结论实际上只是对卜凯研究的微观补充。^⑤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的马若孟,强调了华北农民作为理性人,实际上在近代商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产值的增长多于人口增长的负担,人均收入长期稳定。在华北农村,土地分配差异也没有更为悬殊,也存在着竞争性市场可以让农民进行自由交易。中国农业经济的出路关键还是广义上的技术进步,如以改良品种等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建造基础设施来方便市场化等。^⑥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包含华北研究在内),理论建构和问题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上一时期,强烈影响研究中对于史料的选择。二战后美国几代学者都在追问为什么失去了中国。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使得大批学者逃离了中国研究,但是这段时间的研究总体而言无法逃离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理论,以及之后的现代化理论,这些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标准 and 内核,来比照中国是如何走向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中国学者在中国革命话语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性质和矛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论争。相比于重视生产力研究的西方,中国学者更加注重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论及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即为“五朵金花”。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看,最为突出的则为江南史的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区域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发达的手工业,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议题之下,作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和讨论。江南史研究迅速蓬勃发展,势头迅猛,直至现在历经海内外三、四代学人,其研究和视野也经历了几次范式的转换,积累丰厚,成果辈出,蔚然大观。华北区域的研究在这

一时期可以说是受到了江南史研究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而对于二战后日本来说,“满铁”调查资料自身带有“殖民调查”的色彩,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马若孟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学界颇具影响,日本学者才开始重视作为史料意义上的“满铁”调查。虽然如此,但日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从未中断,从战时著名的“平野—戒能论战”起,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实际上,在争论背后同样是西欧社会作为标准存在的前提之下,应该将日本社会定位于亚洲型(即与中国相同)社会还是西欧型社会的现实性课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日本的现代化向何处去的问题。^⑦这一时期的中外研究,不论是对“满铁”调查使用与否,都体现出极强的理论色彩,甚至有时学者的预设太强,其研究所表达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史料所体现的内容。这一时期同时还存在另一个明显的研究趋势:在对近代科学的强烈推崇下,史学研究也出现了强烈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即经济史的学者专心研究商品、市场和计量等,在政治史范围的研究则专注制度、精英和政治事件等,学科之间的壁垒森严也严重影响了各领域学者看待和选择史料的态度。即使他们选择华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但其实华北则往往作为中国整体的代表或某种现象的典型而进行表述。学者带着从上而下的眼光来俯视华北,因此不论是否使用新史料,有时都只是在诉说同样的一套道理和假设。

三、“旧”史料与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是华北区域研究,整个史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学术范式的变化,其中重新审视“旧”史料和发现新史料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对于“旧”史料再解释的案例,最具代表性的即为黄宗智(Philip C.C.Huang)。同样使用“满铁”调查作为其研究的主体材料,对中国华北地区进行研究的黄宗智却得出了与马若孟完全不同的结论。黄宗智在八九十年代出版了其经典之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书都大量使用了“满铁”调查,提出了轰动一时的“内卷化”理论(也称“过密化”理论),即没有发

展的增长,认为传统中国发展至明清,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并且在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上没有产生革命性突破,因此在有限的耕地中不断增加人力投入使得产量增长,农业生产不断集约化直至边际报酬递减也无法产生新的结构性转换和突破。^⑧

黄宗智的研究对于中外史学界都产生了无可置疑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其研究结论是否正确,他的研究的示范性价值尤其体现在理论性意义和范式规范转变。在对华北和江南的区域性研究中,他从史料中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与之前上述时代学术理论逻辑无法容纳的“悖论现象”,即“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不论是他所使用的“满铁”调查,还是之前学者所使用的“旧史料”,都显示出了很多与旧有理论范式逻辑相悖的现象同时出现,这一现象不只是对于旧有结论正确性的反驳,更是从因果关系上对于整个理论系统挑战。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规范,抑或是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都有着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如几乎都把商品化的市场经济等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必然会导致现代化;又如将农村的农业商品化归结为农场主或地主的求利行为的结果;再如近代化的进程必然为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共同近代化的历程。这些默许的信念源于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近代化经验,而中西两种理论的创立者(来自西方)都将这种西方近代化历史经验抽象化为一种普适性的最优解。而中国学者不论是出于意识形态,抑或是民族主义,在使用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的情况下,其所做出的反驳也不过是“中国走的是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扰了原有的进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也是沿着这样的理论假设思路发展起来的。但是无论是试图说明中国与西方一样,还是中国与西方不同,“传统”与“现代”、“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毫无疑问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二元划分历史,还是没有脱离那些不言自明的前提。^⑨实际上,在前人的实证研究中已经揭示了很多与这些前提不符的悖论现象,但是不加批判地运用这些西方逻辑的理论规范使得学者容易

落入“理论陷阱”。大量记录华北社会生活细节的“满铁”调查则具体而微地提供了黄宗智了解和提出这些悖论现象的条件,他发现中国历史上明清繁荣的商品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必然导致现代化的发生;农业的高度商品化也可能主要是由于人口压力下导致的生存策略;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也不必然是乡村的发展,甚至在中国实际显示出与之伴随的是乡村的衰退,因此他提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化”理论。^⑩虽然他的结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学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激起了学界一场热火朝天的论战,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甚至写了一篇名为《数字游戏》的文章来证实学者可以通过对于土地数据修正之后做出任何有利于自己理论立场的解释。^⑪

历史上的数据资料由于各种原因可以被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解释史料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范式的重要性就尤其凸显出来。黄宗智没有试图整合之前理论中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等二元对立理念之间的偏重,而是试图突破二元性规范性认识的缺陷和危机,他意识到了旧有的逻辑悖论,转向从中国历史实际中找寻问题的答案。虽然历史研究中解释和叙事的意义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史料,任意处置史料来合理化自己的解释,并不会导致像前述一些研究中有牺牲历史事实来表达理论的风险。与此相反,这样的理论意识则更加注重史料和文本,并且更加注重地方和区域。在宏观层面或使用大数据计量统计的分析研究方法,很容易忽略遗漏了鲜活的历史细节,难免会套用既有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和讨论。而微观层面的区域性史料,从技术层面可以使学者更加丰富地掌握一个时期这一地方的“整体性历史”,原本被学科分割的历史事实可以在区域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从而可以跨越学科的分野,提出不同以往理论为先的实证问题,达到在历史现场自身中发现问题和解释。

黄宗智的研究其实也体现了一代学者的理论变化与问题转向,与当时美国的整个时代政治和学术风气息息相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趋向专门化、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门类分明的总体情况之中(即跨专业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少),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异军突起,将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应用于传统中国的商业系统,强调将中国划分为不同区域,进行长时段结构性的研究,对于他之后的一代学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②在他之后的学者们在著书立说之时几乎都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空间感和区域差异的意识则往往使得学者选择具体地方区域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像之前将整个中国地区视为单一体系进行研究。^③而美国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使得一整代学者都对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话语进行反思,对于前一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各种方向上的批判,从权力、文化、语言、性别、环境等等各种层面去中心化。如果说黄宗智的研究是抛弃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试图从中国历史自身中发现新的理论和范式,那么加州学派则直接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比较,他们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在全球视野的坐标体系中,将中西作为对比,认为西方的发展道路才是特殊和偶然的。彭慕兰以华北和江南区域为案例,提出了著名的“大分流”理论,认为直到18世纪前,中国并不比西方的发展落后,而是欧洲由于能源、技术等特殊原因在18世纪克服了增长限制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④日本学界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范式的转向,80年代之后出现“赋予战后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特色的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主张的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增强了对中国社会富有个性的特殊性质的关心”。^⑤中国具备自身特性这一认识成为新的研究前提,也与80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以森正夫为代表的“地域社会论”密切相关。具有政治关怀的“共同体”论争已经淡化,学术潮流从宏观的政治和社会课题变得更加离心化和分散化,学者往往以地域社会为视角来多侧面观察当时人们和组织的行为规范和秩序原理。^⑥8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眼光向下”,都经历了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的巨大转向。

四、新史料与新方法

近年来学术志趣与主题的分散化多样化,除了共同的理论前提和学术范式的转换之外,史料的丰富化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因素。以往正史经典作为最容易获取的史料,学者也就便宜以其内容为研究对

象。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料的概念在学术问题意识的转向后变得更加扩张,地方性和民间性材料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史料”得以“发现”。“新清史”的兴起即为一例,他们在去中心化的学术潮流之下,研究方法上强调以满文史料为主的非汉文文献,试图用内亚视角来重新解释清朝历史。然而“新清史”的代表性人物欧立德(Mark C. Elliott)就指出,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最早发现满文档案的史料价值,并开始整理和刊布。^⑦而80年代中西交流的发展,使得外国学者能够接触这批被开放和整理的满文史料,从而使得“新清史”派学者有了使用“新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前提。^⑧同样,日本“地域社会论”研究的盛行也与“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密切相关。80年代以后中日学术交流也进展迅速,外国研究者能够进入中国档案馆利用原件进行研究,并且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互动,因此有更加细致微观的历史细节作为载体能够使得学者进行地方性区域性观察。

在新的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下“新史料”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即为民间契约文书的大批量发现和整理。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始大量发现并整理出版民间契约文书,引发了学界的轰动。50年代以来逾数十万件的徽州文书的发掘整理,被誉为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新资料第五大发现,徽学也在此基础上蔚然成风。^⑨此后各地文书相继整理出版,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文书群除徽州文书群外,主要是清水江文书、浙江石仓文书、太行山文书、清华馆藏文书等,其他地区如京津、上海、四川、甘肃、台湾等多地都有文书汇编付梓,可谓形成了学界的“文书热”。

然而遗憾的是,总观已经出版整理的契约文书材料中,华北地区的文书发现和刊布数量仅占少数,集中程度也较为不足。近年来以学校和个人为主逐渐发行出版了一些集刊和汇编。在河北省,数量较大、最为集中的则是邯郸学院搜集整理的太行山文书,目前已经出版了两本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系列丛刊。^⑩此外,朱文通在沧州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偶然发现了一批契约文书,并选择其中的典型辑录下来。^⑪张玉在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发现当地

张氏家族保有大量从清代至民国的地契,将其梳理成文。^②张正明、陶富海将他们在山西襄汾县丁村民宅发现的部分土地文书初步整理刊发。^③山西大学郝平也将自己研究过程中搜集到的契约文书摘选汇集汇编。^④河南省的契约文书多集中在洛阳一带,洛阳民俗博物馆和洛阳匾额博物馆整理了清代民国大量的地契文书,汇集出版了五册的《故纸拾遗》。^⑤山西地区的契约文书以山西大学的郝平教授等人为主进行搜集和整理的山西契约文书,并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⑥此外早期张正明和陶富海也曾发表论文刊入其搜集的契约。^⑦山东省的契约文书主要是以孔府档案影响较大。^⑧

不仅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整理呈现南多北少的状况,区域研究中华南学派也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前沿的学术共同体。华南学派以南方为主要研究对象,上承接傅衣凌与梁方仲的学脉,外注重与科大卫、萧凤霞等国际学者进行密切合作,树立起“历史人类学”的旗帜,对于区域史研究引入了跨学科方法的典范。^⑨这一时期,在华北区域研究也产生了大批的学术成果,下文以南开大学和山西大学两所华北研究重镇为例,说明80年代以来国内华北区域研究的趋势和特性。

这两所大学都是在80、90年代社会史研究复兴的潮流下开展了对于华北区域的研究,但仔细察来却名同实异、各有所长。南开大学的华北研究从研究时段相对来说更偏向于以民国为主,受到冯尔康所倡导的“专史”的社会史和谱牒学研究方法的影响^⑩,以魏宏运^⑪等人建立起来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为关注点的学术传统为基点出发,团队中的个人关注专题包含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各有不同。王先明师从陈振江,以近代史的社会转型为主要学术关怀,从文化和权力等角度对于华北乡村中的社会阶层和流动,“新”与“旧”的变化着力较重。^⑫张思是岸本美绪的学生,受到日本学术传统的影响,运用“满铁”调查资料,对于共同体问题讨论颇多。^⑬江沛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线索,讨论了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的乡村、城市以及铁路交通等众多议题。^⑭常建华延续冯尔康的路径,在华北宗族研究领域成果丰富,建树颇多。^⑮王利华以中古

时期的华北环境变迁史研究和农牧业以及饮食等文化研究为主。^⑯李金铮以近代华北农村的乡村金融为研究出发点,延续到近代以来的经济思想研究和南方地区的乡村金融借贷研究。^⑰南开大学的华北区域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80年代以来的史学趋势,在社会史转向的大潮之下史学研究愈发细致化、专题化,不再像50-70年代以宏观的政治史、经济史研究为大势,而是专注于具体的史事和区域来观察其中投射出的国家与社会走向,因此这样的研究所要求的史料也更广泛和多样化,“新史料”也因此被“发现”,^⑱搜寻史料时的路径和思维也是多出于问题导向,淡化理论导向。

山西大学虽然也是在社会史的旗帜下开展的华北区域史研究,但其学术脉络和研究路径与南开大学大相径庭。80年代以来,乔志强主张社会史的复兴,^⑲认为社会史是由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的体系构成,并在此理论思想指导下对近代华北农村进行史料收集和分析,^⑳由此开启了山西大学至今三代人的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对于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对于华北区域研究的时段相对较早,偏重于明清时期,研究主题更为集中和统一。可以看到90年代末以来的山西大学华北区域研究整体转向了将山西水利社会作为主要内容,以水为中心,将资源、人口、环境、土地等要素勾连起来考察山西的区域社会变迁。这一学术理路明显继承了乔志强着重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史观念,从学理上也与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的“治水社会”理论,和日本学术界中影响甚广的“水利共同体”概念直接相关。^㉑

山西大学这样的华北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其所使用的史料以及其史料观念密切相关。从乔志强开始就建立起对于史料的重视态度,^㉒而且他视野广阔,不局限于正史著述,多次进行历史调查和田野工作,搜集编辑了多部乡间田野的资料集。^㉓乔志强朴素的田野调查观念经由其学生后辈行龙、张俊峰等山西大学团队成员发扬深化,总结为“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取向。^㉔虽然与华南学派一样都是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但山西大学团队并不像前者在田野调查中极为关注礼仪祭祀等标识性活动,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对于资

料的收集上,认为田野工作是为了更好进行史料的收集和理解。^⑤史料观念的差异将华南学派导向了对于信仰礼仪等文化层面的讨论,而山西大学的华北研究则集中于对文献材料中所呈现出的人水之间、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探究。另一方面,正是山西近几十年来不断发现的大量契约、账簿、家谱、碑刻、日记等新史料,才提供了山西大学研究团队关于华北区域研究的新的问题与新的理解。

以山西大学华北区域研究为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对新的历史理解和研究书写起到了越来越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近年来陆续入藏的大批华北地区的文书材料,可以成为华北地区地方性文献资料研究的不容忽视的“新史料”。目前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文书数量已近八万件,是极具价值的一批重要史料。其地域范围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华北四省为主,在华北地区中又以山西地区为重,也少量涉及云南、新疆、福建等地,还有越南地区。时间跨度自明代起,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清代民国史料的数量为最。其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分为土地、商业、民俗、教育、公文、外国、少数民族以及其他等八类。土地类文书包括土地交易契约以及相关土地分割的分家书等;商业类文书包括借据、账本、相关执照等;民俗类文书包括婚书、休书、金兰谱、过继单、风水相关文书等;教育类文书包括科举试卷、儒学执照、毕业证书、教育机构委任状等;公文类文书包括告示、功牌、状纸、咨文等;外国类包括国外的各种文书资料;少数民族类文书包括蒙文、新疆维吾尔文、纯满文等文书资料;其他类为未归入上述类别的文书资料。其中以土地类中的土地契约为主体,包括了经过官方认证的红契,也有民间私下交易的草契,按交易类型可分为卖契、典契与租契等。

清华馆藏契约文书中虽以散件文书为多,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襄汾文书中共有103户的归户性文书(第一批入藏22户,第二批入藏81户),具有很高的集中性。清华馆所藏文书的“归户文书”指以文书的事主或当事人为归户性依据,多以家户为主,以一户为单位进行文书的整理编纂。鉴于其他华北地区

发掘整理的契约文书以散件文书为主体,清华馆所藏的这批归户文书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并且,每户的文书数量也非常丰富,目前统计最多的一户达到了89份材料。时间跨度自明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契约类型多样,包括土地交易文书的官契和草契、账本、土地证、书信等。有利于全面细致地对当时家户的历史变迁、经济活动进行还原,以个案为切入点来系统观察当时晋西南地区农村社会的生活与历史。相比较于清华馆藏文书,其他华北地区的文书辑刊呈现出数量较少、系统性归户性较弱的特点。清华馆藏文书以其数量庞大,地域和时段集中,种类形式丰富多样,收藏状态良好的特征,显露出了极高的研究价值,填补了北方文书相对南方数量不足,种类不够的缺陷,已经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其相关研究也初露锋芒。^⑥

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派”“中国经济派”开展社会史论战,中国学界就以华北为主要场地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这一时期讨论的核心在于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本质,目的在于探求中国何以自救和富强。因此,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农村和土地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和重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70年代的历史研究是在以苏联模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进行的。在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中,经济史的地位又明显上升,并且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新语言新视角来解释历史。直至这一时期都可以看到史学界为了突破清代烦琐考据的小学,而在清末“新史学”以来试图对历史“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西方和日本史学界虽然与中国交流不多,现实和学术需求也不同,但研究方式和问题意识却有相似之处。因此,对于史料的认识和使用也有共通之处,他们大多在掌握华北区域性的正史史料和田野调查之后,努力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认识。

而80年代以来,不论是国内社会史复兴的潮流、日本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抑或是欧美后现代叙事化的史学转向,都是对普适性的历史公理的怀疑,学者们开始注重中国历史区域性微观性的社会空间内的本土社会秩序。这不只体现在华北区域史研究中,

加州学派以经济繁荣的江南为研究的对象与西方做全球性的比较;或者“新清史”以“满洲”为研究的对象,从中国东北和蒙古等内亚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研究所引发的巨大反响,都表现了研究者们不再执着于对代表性和典型性区域的追寻,而是在具体的有差异的地域独特性中释放出中国历史的多重面貌。史观的范式转换导向了史料概念的扩展和扩充,多样的史料形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史料的发现和呈现,如大批原始档案的开放和契约文书的发现也使微观的深描式研究成为可能,这也指明了未来继续从区域社会看向中国历史的研究方向。

历代的史料选择和研究无不伴随着对以往问题意识的反思和超越,那么在新的时代关怀的今天,我们对于民间契约文书的重视,是期望以区域个案的本土性史实细节,以长时段跨学科的综合性地地方知识,重新审视以往宏大叙事框架的理解和判断。中国的历史长时期被抽象的国家层面宏观框架所替代和忽视,民间契约文书则提供给我们从微观的地域、族群、时段的层累叠加和交流冲突来深化和改进对于传统社会的整体认知的可能。既然是微观的地方性个案,则意味着不同的地区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华北的故事复杂特殊而至至关重要。如果华南研究可能是讲述海洋、宗族建构的故事,内亚研究可能是讲述游牧、帝国建立的故事,那么华北研究则是中原、国家制度的叙事。华北作为前两者之间的广大区域,“国家在场”是其最突出并且公认的特点。千百年来华北作为国家统治的中心,经历了历代王朝的更迭和族群的角力,多元和层垒是其故事丰富性的来源。各异的文化、语言、族群、风俗与制度在时间的激荡下互相碰撞包容,通过华北这一空间场域相互作用形成了既有地方又有中央、既有变化又能持久的特殊秩序。^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史料,二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历史学科的每一世代研究问题和范式的转换都有华北研究的贡献,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复杂性和层垒的长时间性,以及其之于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在新时代新问题下,华北故事的讲述需要新材料的支持,而清华馆藏的华北民间契约文书等本土性的文

献资料则为讲好这个故事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华北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作为史料能够使得我们从经验的实证的历史现象出发,提出属于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问题理论。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历久弥新,突破以往的理论规范,对中国整体理论框架叙事有所深入和推进。

注释: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②这一时期的华北社会调查主要以农村为对象,成果非常丰富,如李有义《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徐雍舜《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黄石《河北农民的风俗》、蒋旨昂《卢家村》、黄迪《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等;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有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

③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年,第1页。

④Carl Riskin,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Dwight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49-84.

⑤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⑥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4页,第329-333页。

⑦岸本美绪:《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⑧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8-167页。

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81页。

⑩黄宗智、强世功:《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3期。

⑪Joseph W. Esherick,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7, no.4, 1981, pp.387-411.

⑫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⑬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朱政惠:《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⑭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⑮岸本美绪:《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

间团体论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⑩森正夫：《“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⑪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2006年24卷第2期。

⑫王晴佳：《创新与求变：欧美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新潮》，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90-91页。

⑬徽州文书的搜集整理已有大量成果出版，如安徽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后编辑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又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4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影印出版，周绍泉和赵亚光校注的《窦山公家议校注》（黄山书社1993年版）、刘伯山教授主编《徽州文书》系列的陆续出版发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6、2013年版）等。

⑭康香阁：《太行山文书精萃》，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鲁书月、顾海燕：《学术名村“十里店”文书：王氏家族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⑮朱文通：《沧州土地文书辑存》（一）—（五），《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1988年。

⑯张玉：《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述略》，《文物春秋》2005年第1期。

⑰张正明、陶富海：《清代丁村土地文书选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⑱郝平：《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选编》，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⑲《故纸拾遗》（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故纸拾遗》（卷二），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故纸拾遗》（卷三），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故纸拾遗》（卷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故纸拾遗》（卷五），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⑳例如郝平：《晚清民国晋中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初探——基于晋中地区契约文书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郝平：《小谈清代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博览群书》2015年第11期；李宇：《浅谈清代山西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沧桑》2014年第4期；李宇：《晋冀鲁豫边区的契约文书》，《党史文汇》2015年第3期；郝平、李宇：《勒价抑买还是族内救济——基于清代晋西北地区亲族间土地买卖契的考察》，《山西档案》2015年第2期；李宇：《契约所见清代山西土地价格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等。

㉑张正明、陶富海：《清代丁村土地文书选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共24册），齐鲁书社1980-1985年版。

㉓仲伟民：《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光明日报》2005年6月30日。

㉔如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

期）、冯尔康《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社会史专辑”）等。

㉕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㉖参见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㉗参见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等。

㉘江沛：《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南开学报》1998年第4期；江沛：《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江沛、熊亚平：《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等。

㉙参见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㉚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等等。

㉛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

㉜这一点也可从南开大学上述学者编辑出版多套历史资料集这一现象中体现。

㉝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年8月13日。

㉞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㉟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张俊峰：《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㊱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㊲如《退想斋日记》《潜园琐记》《晋祠志》等资料集即为乔志强于田野调查中获得。

㊳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㊴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㊵如仲伟民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兼评〈明清歌家研究〉的学术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5月22日）就使用了清华大学馆藏契约文书，激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热度延续至今。

㊶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邱源媛：《华南与内亚的对话——兼论明清区域社会史发展新动向》，《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